忆周翰师

张 隆 溪

文革后的北京大学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学一样,似乎空气里都充溢着一种自由开放的气息。我正是在这时候从四川成都来到北大,进入当时的西方语言文学系(它包括后来独立出来的英语系),做杨周翰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周翰先生是研究莎士比亚和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我由他指导,专攻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文学。当时国内还没有设立博士点,北大的硕士研究生一共学习3年,除上课之外,还要通过笔试和口试,写出有相当份量的论文才能毕业,所以比起国外一些大学的硕士来,其实有更扎实而且严格的训练。当时北大西语系有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等许多著名教授,我们这些文革后首批进校的研究生能够得到他们指点,真是十分幸运。我们读书的热情很高,但当时在北大,新近出版的外文原版书却少得一见。李赋宁先生给我们开课,讲英国文学选读,所读作品就要靠系里专人用老式的打字机打在腊纸上,然后油印成册,用作教材。课堂上主要由李先生讲,相当于国外大学的 lecture 一类课程。李先生曾留学耶鲁,我们很佩服他的英语讲得准确流畅,而且十分文雅。杨周翰先生上课则采用讨论的形式,相当于国外研究生的 seminar 课程,主要用中文。但有时候他用英语讲几句,便是纯正的英国口音,因为他曾留学牛津,讲英语有特别的韵味,令人不禁油然起敬。

周翰先生平时不苟言笑,严肃稳重,所以不很熟悉他的学生们

对他都有几分畏惧，而跟他接触很多的学生，就知道他其实对年轻人非常爱护，也很容易接近。不过他的确要求严格，不轻易说人好话。我知道周翰师对我十分厚爱，常常在卞之琳、王佐良等与他同辈的好友面前，表示满意我这个学生。可是他从来不当面夸奖，他对我的赞许，我也只是从旁人那里偶尔得知一鳞半爪。然而惟其如此，师生之间的情谊弥觉珍贵。那时候周翰先生家里有一部日产的彩色电视机，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可不是一般家庭里容易找到的摆设。我们几个研究生经常晚上到北大中关园杨先生住处，既是为向他请教学问或随便聊天闲谈，也常常是为去看一点彩色电视节目。在周翰先生家里与他谈话，更能感觉到他的自在随和，而且与先生的夫人王还教授以及他们的子女也熟悉起来，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亲切。最让人感受深刻的是1981年我们那届研究生毕业时，周翰先生在北大西语系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很短，既没有讲要我们毕业后为国为民作贡献的大道理，也没有作学术上精深探索的演讲，却以平淡然而亲切的语气，回忆3年来与研究生相处的种种情形。他说，看见学生们学成毕业，就要各自东西，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他竟不免有一种孤独和悲哀的感觉。他当然祝大家为学日进，事业成功，但他讲话中最突显出来的是对学生们真挚的情谊。记得会后有几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尤其感慨，他们想不到平日看来好像不苟言笑的严师杨周翰先生，内心深处却是那么温柔敦厚，对学生有那样深切的感情。

杨先生对他看不惯的事物，倒也的确不讲情面。他不仅严格要求学生，不容许任何人偷懒或敷衍塞责，而且对妨碍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外来干扰也十分反感。记得有一次，突然有中宣部、教育部和北京市委派人来北大，调查学生的思想状况。那大概在1982年，当时我已经留校在北大西语系教课，分在由周翰先生负责的文学教研室。3位上面来的人到西语系文学教研室，说明他们来的

目的是要问我们给学生上了些什么样的西方文学课，可能对学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杨先生闻言勃然大怒，用手在桌上一拍，对他们3位说："你们走错地方了！我们这个系从来就强调语言教学，从来就不教什么文学！"我还从未见过杨先生发那么大脾气。他接下去又说，只要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出什么乱子，你们就来问我们教了些什么文学作品，这让我们教文学的教员们怎么工作？现在社会上做坏事的人要是真能念一点文学作品，读一首诗，看一部小说，也许他们就不会做那些杀人放火、伤天害理、贪污腐败的坏事了。几句话说得那3位哑口无言，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周翰先生曾从拉丁原文翻译罗马诗人荷拉斯的名作《诗艺》，他的确像荷拉斯那样坚信，文学不仅能愉悦人，而且能给人教益。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坚持文艺的教化作用成为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信念，但周翰先生不仅是在重申此信念而已。在当时的特殊情形下，他是在对以政治来压抑文学教学和研究提出抗议，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粗暴干预表示深恶痛绝。在当时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人看来，文学似乎总是可疑的，西方文学更是传播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危险渠道，所以教西方文学就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在那些人眼里，似乎文学就是毒草，教文学的教员就好像是毒害青年的教唆犯似的。周翰先生在文革中吃够了这种极左思潮的苦头，所以在文革后相对开放的环境里，就再不能容忍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他那次发火使那几位派来北大调查政治思想状况的人颇为尴尬，但也很可以见出他的真性情。

周翰先生对文学的热爱，从他的谈话和写作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主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两卷，收集各国莎评的精品译成中文，在国内影响很大。他自己研究16和17世纪英国文学，也兼及18世纪英国小说和20世纪现代派文学，尤其是艾略特的诗和文学批评。这些研究成果都写成文章，收在先生所著《攻玉

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等书里。在这些书里，周翰先生不仅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而且选取不少精品整段甚至整篇译成中文。这一方面使他的议论能避免抽象空洞的毛病，另一方面更使读者能透过译文窥见英国文学中一些优美篇章的风格和文采。此外，这些书虽以研究英国文学为主，但也在不少地方有意识地与中国文学作比较。如《攻玉集》中有“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一篇，由《失乐园》第二部提到中国“靠帆和风力前进”的车，讨论弥尔顿广博的知识和修养。这篇文章不仅论弥尔顿，而且旁及许多17世纪英国作家，尤其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对远方中国的了解和想象，讲到有关中国的知识当时在欧洲传播的情形。周翰先生引用不少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字句，又涉及作家的学识与创作之关系、文学中的借鉴与影响等诸多问题，写得内容丰富，饶有兴味。这和一般的比较文学论文不同，不是单纯拿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与一部西方文学作品来作牵强的比附，而是在深入讨论弥尔顿作品的当中，涉及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另外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一书里，有“弥尔顿的悼亡诗”一篇，副标题是“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那就更明确是作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尝试。这篇文章前半部分论弥尔顿悼念亡妻的一首14行诗，不仅翻译了诗的全文，而且对诗中意象及其宗教与神话的背景，作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后半部分则转而讨论中国历代的悼亡诗，评论了从《诗经·绿衣》以来许多悼亡之作，对潘岳、元稹、王士祯等人的作品，尤其有精到的评论。读周翰先生这些文章，令人感到他厚积薄发，引人入胜，能给读者许多启迪和教益。他后来更积极带领国内许多学者作比较文学的研究，并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之职，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在1983年10月离开北大去哈佛，与周翰先生不可能像以

前那样经常见面，朝夕相处。但在哈佛的数年之中，我们仍见过好几次，都是周翰先生来美国访问讲学，在哈佛小住时相见。我们一起去波士顿和哈佛附近新英格兰地区游玩，参观在美国独立战争史上相当重要的莱克兴顿等小城镇，也去过著名的沃登湖，凭吊美国的哲人隐士梭罗，遥想他当年在湖畔低徊沉吟的情景。记得最后一次与周翰先生相见，大概是 1989 年的元旦前后。那一年除夕，哈佛比较文学系一位法国来的同学办了一个新年晚会，邀请我们去参加。周翰先生也去了，与我的同学们一起共同迎来 1989 年。大家随意拿些面包点心和饮料，自在地交谈，气氛热烈而欢快。那次周翰先生兴致很高，觉得哈佛的研究生同学们不仅学业优秀，而且互相之间也颇为融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那时我完全看不出他身体有任何不适，可是后来周翰先生回国，不久就生了大病，而且竟几经周折，在远离北京的西安与世长辞。其中大概，我还是从老同学韩敏中和盛宁的来信中，才略知一二。周翰先生去世的消息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他平时身体虽算不得特别好，却也并不特别坏，尤其年初见面时并无不适症状，想不到会变得那么快。先生去时不到 75 岁，虽说已过古稀之数，但在现代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的情形下，也并不算真正的高龄。他 1988 年在美国北卡洛莱纳州人文研究中心作了近一年的研究，对西方理论在 20 世纪的发展颇有心得。如果天假以年，他把自己的思想和心得整理成文发表，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教益。

真所谓光阴似箭，与周翰先生最后那次见面，竟荏苒已过十载，而当年在北京和美国与他相处和会面的许多情形，尚历历如在目前。因为我们那一届是文革之后的首批研究生，经过那样一场文化的浩劫之后，重新回到学院和学问中来，无论是教授或是学生，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而师生之间也往往有格外深厚的感情。那是 20 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回想起来，却仍然令人有无穷的感

慨。周翰先生是一个执著追求学问的学者,是我的良师。在北大3年的研究生学习,对于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有很关键的意义,我对周翰先生也永远怀着崇敬之情。我们这些他当年教过的学生现在大多也在大学里任教,也有在不同地方有自己不同的事业,但如果说学问就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本,那么我们奋发努力,在学问上取得一点进步,就是对周翰师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校区比较文学教授